

## ※ 序跋選錄 ※

# 《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 轉換期之文藝現象》導言(二)

衣若芬\*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明白指出「世情」與「時序」對於文學演進的影響，「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也正是在廿世紀將盡，新的時代即將來臨之際，重新審視這一命題的意義與內涵，透過「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的文藝現象」研討會，凝聚學者的智識，共同思考時代環境與歷史變局對於文學創作所形成的衝擊，以及創發新的文學生命的契機。

收錄於本書的十三篇論文中，關涉漢魏六朝以及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階段的論文各有六篇，聯繫這前後兩時期的，是將南朝與晚唐並比，林繼中教授的〈文化轉型中的文學——以南朝、晚唐歷史變局為例〉。林教授以觀察各種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合力為解釋文學諸現象的路徑，認為「在文化目的的驅動下，文化選擇與文化整合形成藝術史的選擇、修正、適應的過程」，因此文學史變化的動因便是由文化構型而來，文中以六朝為「士族文化構型」的代表，詩壇上由玄言詩→山水詩→宮體詩的滑落軌跡，即為士族由盛轉衰，士族的價值取向從個體對精神超越的追求滑向對感官刺激的滿足的過程，而同樣是趨俗趨豔，以世俗地主為文化主幹的中晚唐社會不似六朝士族嚴士庶之分，而是以「俗氣」為本色，反叛士族的文化傳統，並且瀰漫於各種文體中，成為文化的基調。

中晚唐的「由雅入俗」是為北宋「化俗為雅」的前驅，這種審美趣味的轉換直接反映於文學書寫之中，何寄澎教授的〈從美學風格典範之變易論元和詩歌的文學史意義〉便是以韓愈、白居易的詩作為實例的佳構。元和詩歌在「變唐啓宋」的文

---

\* 本所助研究員。

學史意義方面已經為學者所公認，然而元和詩歌如何「變唐啓宋」，在詩歌美學風格典範的變易問題上則較罕涉及。何教授指出：初、盛唐詩人繼承漢魏六朝抒情感傷且務求含藏婉轉、雅正典麗的美學風格，並加以推擴、變化，至韓愈、白居易則「以文為詩」，鋪敘詳明，泯去身分階級，以普遍之人性本質書寫情感，韓愈務去陳言，大變舊傳統，「以醜為美」、「以怪變為美」；白居易則重視「平民化」、「俗性俗情化」，韓、白之「變」與「俗」，樹立了新的詩歌美學典範，具有開創性的關鍵意義，實乃宋調之先聲。

王基倫教授的〈古文運動與文賦新變——中晚唐至北宋初期賦作發展的考察〉，從文學史、文章內容、文章形式三個角度探討賦作的發展過程，唐代流行律賦，宋代盛行文賦，中晚唐至北宋初期二者並行，並且為律賦演進至文賦的過渡時期，王教授認為文賦隨古文運動而變遷，與古文合流，扭轉了文學史上賦、詩、文相抗衡的地位，也開啓了宋以後古體派與律體派的賦體之爭。宋賦在形式上不受限於押韻格式，強調意境的作法，開展出了議論理趣及閒適沖淡的新風格。

衣若芬博士從題詠繪畫的題畫詩著手，析論〈晚唐五代題畫詩的審美特質〉，以「方寸巧心通萬造」、「緣象生情，象外求象」、「水墨的興味」等三個主題，分別從創作論、鑑賞觀、創作與鑑賞互相激盪興起的新畫風三個層面立論，該文指出：晚唐五代是繪畫美學創作論自六朝關心「筆」與「物」的關係，過渡到注意「人」與「物」、乃至「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時期，亦即繪畫「形似」觀念逐漸轉向「形理」並舉的前驅。題畫詩作者結合了繪畫題材的文化象徵意義與文學比興傳統，賞畫題詠時往往借此抒發個人情志，並希冀追求圖象之外的品鑑樂趣，為了追求象外之象，而更具體認知繪畫的物質特性，引發日後「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的思考。至於水墨畫的興味，在潑墨奇風和「逸品」畫格的助長之下，既突破了具現實相的色彩觀念，也確立了中國繪畫以筆墨寄託抒情意蘊的特色，促進北宋文人畫的崛起。

歷史上的晚唐五代僅百餘年，在討論晚唐五代詩歌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時，學者一致認為須從中唐開始觀察，除了前述何寄澎教授拈出以韓愈、白居易為代表的元和詩歌美學變易問題之外，周裕鍇教授與黃奕珍教授均注意到賈島的文學評價與僧詩的歷史定位。賈島為中唐後期詩人，其影響力則發揮於晚唐五代，周裕鍇教授的〈賈島格詩歌與禪宗關係之研究〉，全文首先宏觀晚唐五代的詩壇與禪苑，通過對賈島的詩觀和禪觀的透視，分析了苦吟與坐禪對晚唐五代大批仕進無門的讀書人的

積極功能，並借助詩格類著作的說法，闡述「詩為儒者禪」的內涵，探求「賈島格」詩歌在創作上多山林禪院，而在理論上重視儒教比興的矛盾現象，指出此乃士大夫出世與入世心理衝突的反映，進而由「賈島格」詩論著作借用禪宗旨訣論詩的例子，討論晚唐五代詩僧禪詩相融的文化意義。

「賈島格」詩歌雖無反傳統的姿態，但已經背離了元和新樂府運動的諷喻傳統，黃奕珍教授的〈談詩·僧關係的一個面向——以歐陽修論九僧詩為例〉，從歐陽修《六一詩話》與司馬光《續詩話》中關於宋初九位詩僧的記載，聯繫了以賈島為範式的晚唐詩人與九僧的文學創作關係，考察出對於僧詩的系統評論中，賈島未受重視，賈島的文學地位在唐末才逐漸提昇，關於賈島高逸孤絕風格的來源的解釋，亦由雄豪的膽氣與富贍的才華變為蹇澀偏皎的才學，繼承這種見解的歐陽修，因為感受到九僧與賈島等詩人創作的類似性，從評論九僧詩擴充至賈島等人，以往以清和澄靜為評價詩僧的論點，至歐陽修之後轉而視之為才力僻狹、拘於物象，於是被以落拓文士對待的賈島，便由於與九僧並比而重新界定了在詩僧系統中的位置。

張高評教授的〈王昭君形象之流變為唐宋詩之異同——北宋詩之傳承與開拓〉採取主題學的方式，選擇唐宋近八十首詠昭君詩為例，從體制偏好、主題取向、敘事視角、意象經營、寫作技巧和創造造語各方面，比較唐宋昭君詩之異同，以彰顯宋詩新變之價值。全文由《漢書》、《後漢書》、《琴操》、《西京雜記》等相關記載形塑昭君之歷史原型，考察《全唐詩》所載大約八十首、《全宋詩》北宋部分約五十餘首，南宋部分超過八十七首以上的昭君詩，依昭君形象的主題類型分為一、漢宮秋；二、出塞淚；三、異域恨；四、琵琶怨；五、身後名五點加以細論，得知唐宋詩人詠歎昭君大抵以《西京雜記》為原型，唐人多用樂府，宋人則好七古；唐詩精要婉約，化景物為情思，宋詩變詠史為敘事，並汲取詠史詩之長，會通於敘事詩之中，往往出之以議論翻案，寓物說理，借事明義，異化、新化、深化、廣化了昭君題材的詩作，由此更可得見宋人開創之功。

以上七篇論文雖然各有依據的文本與探討的議題，但是關心的主旨卻是相近的，即肯定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轉型階段，文化變遷的起點大約自中唐元和時期的韓愈、白居易開始，中唐後期的賈島至北宋僧詩為一變，北宋中期的歐陽修、蘇軾則又一轉折，文壇上的領導者與主要的創作者從漢魏六朝的士族轉為平民菁英階層，於是從意識形態、審美趣味到情感表達方式都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以下便依序申述之。

## 一、意識形態的轉化

漢魏六朝感時傷逝的人生悲慨在元和時期轉為對現實世界的關懷，從細瑣淺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人的本質，所謂的「自我」不是由階級身分所認定及構成，而是從生命的底層——那被譏嘲為「輕俗」的人事之中開顯出來。徬徨歧路的文化心靈一方面未能直接忤逆儒家的道德傳統，從而又希冀於宗教中獲得超昇與救贖，以賈島為代表，兼俱僧侶與文士的詩人從禪宗話頭裏尋求文學的價值與意義，修道的坐禪與創作的苦吟在「不立文字」的前提之下看似矛盾，然而退一步設想，在禪定的寧靜狀態中搜字覓句，在非功利的書寫活動中安頓個人與時代的苦難，未嘗不失為一種修行方式，為了達到清和平遠的詩境，以致少食人間煙火，流入「蔬荀氣」、「酸餽氣」的批評。此外，在思索「人」的本質時也對應著對於「物」的理解，人如何掌握物、應用物，乃至於以人為造物主化育萬物，便是人之終極價值所在，唯其肯定了「道在人事不在天命」，人的主體意識才能獨立於塵世，上友古人（例如昭君），綜觀歷史，並且以史為鑑，以史明志，文化的薪傳方得以生生不已。

## 二、審美趣味的新變

審美判斷的取捨不僅是人對於物的價值認定，也是人對於自我的體察，韓愈「以醜為美」、「以怪變為美」，白居易「以俗為美」，皆是在固有的價值體系中力塑新的個人格調，賈島的以禪入詩，恬淡清靜，乃至九僧的摹刻物象，白描人世，看似超逸出眾，其實未嘗不是另一種「俗情」，這種俗的傾向也正是文化生命力之來源。晚唐五代文人對於感官世界之彩繪與謳歌，淋漓盡致以致於色相紛擾，終至歸返無色之色，水墨逸品既突顯了畫家創作的自主性與精神意氣，在自由的筆墨使轉中朝「象外」追尋「美」的各種可能，同時也會通禪理，化繁複之眾聲為簡約之清音，向內心直指性靈境界。

## 三、抒情傳統與文體形式

詩人訴說表情的方式影響了對於形式的選擇，含蓄婉約的五言詩與雄辯滔滔的

七古是唐宋詩人歌詠昭君時不同的取徑，體制格律嚴謹的唐代律賦隨著古文運動的推衍而在對偶、平仄押韻等方面逐漸散文化，晚唐的諷刺小品賦即是宋代文賦之過渡，爲了更自如地設問鋪敘、議論述志，宋代文賦已不限於頌美雅正之內容，由於書寫題材的豐富性，抒情寫景與反觀內省兼容並蓄，因此文體的演進固然是縱向發展的結果，但也與橫向的抒情表意習性深切相關。

總之，學者們均各自就所專長，對「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歷史變革，提出了文學史上的實際例證，對於推陳出新的文學寫作，開啓了重要的研究向度。